

# 文化与社会

[英国] 雷蒙德·威廉斯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 文化与社会

〔英国〕雷蒙德·威廉斯 著  
吴松江 张文定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新登字(京)159号

*Culture and Society*

1780-1950

by *Ruymond Williams*

本书根据 *Penguin Books* (企鹅丛书)1983 版译出

文化与社会

[英国]雷蒙德·威廉斯 著

吴松江 张文定 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320 千字

1991 年 12 月第一版 1991 年 12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1—3000 册

ISBN 7-301-00133-9/C·26

(平装)定价:6.80 元

# 目 录

译者前言	1
年代简表	11
前 言	13
导 论	15
第一编 十九世纪传统	23
第一章 对比	23
一、伯克与科贝特	23
二、骚塞与欧文	45
第二章 浪漫派艺术家	59
第三章 穆勒论边沁与柯尔律治	81
第四章 卡莱尔	107
第五章 工业小说	127
《玛丽·巴顿》(1848) 盖斯凯尔夫人	127
《北方与南方》(1855) 盖斯凯尔夫人	132
《艰难时世》(1854) 狄更斯	133
《西比尔,又名两国记》(1845) 狄斯雷利	138
《奥尔顿·洛克》(1850) 金斯利	142
《费立克斯·霍尔特》(1866) 乔治·艾略特	145
第六章 纽曼与阿诺德	154
第七章 艺术与社会	178

<b>第二编 中间时期</b> .....	213
一、马洛克.....	214
二、新美学.....	219
三、吉辛.....	228
四、萧伯纳与费边主义.....	237
五、国家的批评者.....	245
六、休姆.....	251
<b>第三编 二十世纪的见解</b> .....	259
第一章 劳伦斯.....	259
第二章 托尼.....	279
第三章 艾略特.....	294
第四章 两位文学批评家.....	314
一、理查兹.....	314
二、利维斯.....	325
第五章 马克思主义与文化.....	338
第六章 奥威尔.....	362
<b>结    论</b> .....	374
大众与群众.....	376
大众传播.....	379
大众观察.....	384
传播与共同体.....	391
文化与生活方式.....	398
共同体观念.....	406
一个共同文化的发展.....	410
<b>后    记</b> .....	417

## 译者前言

雷蒙特·威廉斯是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1921年生于威尔士边境一个铁路信号员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村办公立学校，1931年到阿伯杰维尼(Abergavenny)语法学校学习，1939年入著名的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1942年应征入伍，在英军装甲师任坦克连上尉。在服役期间，他还编辑过军队报纸。1944年10月返回剑桥。1945年10月被委任为牛津大学班级委员会指导教师。1947年至1948年，曾主编极有影响的左派杂志《政治与文学》(*Politics and Letters*)。1971年被选为剑桥耶稣学院院士，1974年任剑桥大学戏剧讲座教授(剑桥建校设立的第一个戏剧教授席位)，1988年逝世。

威廉斯出身于一个普通工人家庭，从青年时代起就关心社会和工人的命运，很早就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14岁时就参加过工党的活动。入剑桥大学后，他的工人阶级的背景和剑桥作为一种上层文化堡垒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冲突，这种冲突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和学术的选择。能进入剑桥大学本身就是一件极不容易的事情，在剑桥的学生中，工人阶级出身的占极少数。这种文化背景使他逐步放弃工党的信仰，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并于1939年12月加入英国共产党，成为英共学生支部的重要成员。1945年后，他主编《政治与文学》时，开始较为系统地研究西方文化，进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并且在以后成为同德语的卢卡契、法语的萨特齐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论发展史上举足轻重的文化批评家。

威廉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治学精勤，研究范围几乎涉及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在语言学、思想史、文化史与文化理论、社会学、戏剧、新闻传播学、文化批评等方面都有专著发表，创作过小说、剧本及电影纪录片的脚本。主要理论著作有：《阅读与批评》(*Reading and Criticism*, 1950)、《戏剧：从易卜生到艾略特》(*Drama from Ibsen to Eliot*, 1952)、《戏剧表演》(*Drama in Performance*, 1954)、《文化与社会》(*Culture and Society*, 1958)、《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 1961)、《传播》(*Communications*, 1962)、《现代悲剧》(*Modern Tragedy*, 1966)、《戏剧：从易卜生到布莱希特》(*Drama from Ibsen to Brecht*, 1968)、《奥威尔》(*Orwell*, 1971)、《英国小说：从狄更斯到劳伦斯》(*The English Novel from Dickens to Lawrence*, 1971)、《乡村与城市》(*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1973)、《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e Form*, 1974)、《关键词》(*Key Words*, 1976)、《马克思主义和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1977)、《唯物主义和文化的若干问题》(*Problems of Materialism and Culture*, 1980)、《文化》(*Culture*, 1980)、《文化社会学》(*Social of Culture*, 1983)等。他还有四部小说：《边远的乡村》(*Border Country*, 1960)、《第二代》(*Second Generation*, 1964)、三部曲《为马诺特而战》(*The Fight for Manod*, 1979)及《志愿者》(*Volunteers*, 1978)。

《文化与社会》是威廉斯的成名之作，1958年初版后，已重印了20多次，被译成意大利文、日文、德文等多种文字。威廉斯对文化的关注是从编辑《政治与文学》时就开始了，《政治与文学》的目标就是以现代人的体验来重新探讨和诠释“文化”一词所描述的传统。1950年开始写作的《文化与社会》，可以看作威廉斯在编辑《政治与文学》杂志时对文化探讨的延续。

在讨论文化观念时，威廉斯首先注意从语言的变迁来审视更广大的生活与思想的变化。从18世纪50年代到19世纪初，在当今世界上有几个极为重要的字眼首先变成了一般通用英文词，或

者在原来普遍使用的基础上赋予了新的意义。威氏认为有五个词即 Industry(工业)、Democracy(民主)、Class(阶级)、Art(艺术)、Culture(文化)可以代表新词变迁的模式,而这个模式可以看成一种思想文化变迁沿革的地图。在现代的社会结构中,这五个词的重要性随时可见,它们在关键时刻的“变化”可以看到人类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化。

接着,威廉斯具体审视了从18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活跃在英国思想界和文学界的40位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作品及其在文化方面的陈述(当事人的实际语言)及其贡献。威廉斯把这40人分为三个不同的时期:把伯克、边沁、布雷克、华兹华斯、欧文、柯尔律治、穆尔骚塞、拜伦、雪莱、托马斯·阿诺德、济兹、卡莱尔、纽曼、狄斯雷利、罗斯金、乔治·艾略特、金斯莱、马太·阿诺德、莫里斯、惠尔斯、佩特等生活在19世纪的26人列为第一时期,这个时期形成了一个“19世纪的传统”;把马洛克、萧伯纳、王尔德、吉辛、贝洛克、托尼、休姆等7人列为“中间时期”,这几位处于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期的作家没有什么创新的东西,但他们所作的努力是在演出前代作家未竟的事业,在作新世纪的一种试探,他们所代表的是交替时代文化精神的一种浮现;把D.H.劳伦斯、T.S艾略特、理查兹、利维斯、奥威尔、考德威尔等6位作家列为第三时期,即把他们作为“20世纪见解”的代表。威廉斯在本书的书名后曾加了一个注:“1780年至1950年”。威廉斯是从1950年开始写作此书,因而他所谓的“20世纪的见解”显然只局限于20世纪上半叶已成名的作家上。而在这170年间的作家选择上,威廉斯显然遗漏了像彭斯、司各特、奥斯丁、勃朗宁、夏洛蒂、丁尼生、萨克雷、哈代、沃尔芙、福克斯、梅瑞狄斯等著名作家和诗人。为此,在《文化与社会》一版再版的情况下他常常受到人们的诘问。但威廉斯自己认为,书中所涉及的作家是,以“文化与社会”为核心主题使之互相联系起来,读者阅读后能意识到一个传统的存在,本书的任务也就完成了。



威廉斯在50年代初深受利维斯的影响。他的学生、当代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曾说,威廉斯在50年代初是一个左派利维斯主义者。在写作《文化与社会》时,威廉斯开始摆脱利维斯的影响,较多地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了同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对话。在本书中,他比较重视经济发展在社会变化及文化观念演变中的作用。他认为,工业(生产力)的发展是“民主、阶级、艺术和文化”发展的前提,“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也改变人的文化观念。他通过对40位思想家、作家的评述,向读者展现了1780至1950年期间英国哲学、文化、艺术、历史、社会学、大众传播等广泛的领域。尤其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化》一章中,威廉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韦斯特、考德威尔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误解及随意地解释马克思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威廉斯认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相互之间关系论述是对文化理论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贡献。

威廉斯引用了马克思那段著名论述:“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了一定的、必然的、不必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在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学的或哲学的,简言之即意识形态的形式。”威廉斯十分赞叹马克思在这段话中显示

出的文化理论的丰富性和实事求是的立身行事的准则，马克思既看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关系，又对这种关系作了一定的限定，上层建筑的变革是随经济基础的变革“或快或慢地发生”，这是非常正确的，威廉斯认为，上层建筑涉及人类意识，因此必然是非常复杂，它不仅是因为它的多样性，而且还因为它始终是历史的，它包括对现存反应，又包括对过去的延续。

威廉斯在 50 年代写下的论著大多具有对话性、论辩性，本书也不例外。恩格斯 1890 年 9 月 21 日给布洛赫的那封信中申明：“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是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的因素，那么他就把这个命题变得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威廉斯引用这段话之后认为，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强调两者关系的复杂性，但并不意味着放弃经济处于首要地位的原则，只是反对“唯一”的绝对化。而英国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评家却把两者关系绝对化。如韦斯特的“对我们生活的批评，即检验我们是否在为推进我们社会的最富创造性的运动中尽力，成为文学批评唯一有力的基础”的观点离那种败坏马克思主义声誉的文学批评仅一步之遥”。威廉斯指出：“从一般意义上说，文学显然是一种社会活动，而其价值似乎正在于作者获得了某种活力，这种活力显现出来而且直接用于文学方式的讨论。这种活力存在着一种大于文学范围，存在于作家和现实关系的全部复杂之中。”因此把作者获得这种活力归结为参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和政治活动上，“实际上是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了”。威廉斯这个见解是有道理的。试想，如果我们评论陶渊明或者王维时，难道能够把陶诗中乌托邦理想、王诗中田园趣味是否能推动社会发展作为文学批评的唯一标准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根本背弃了艺术的审美原则，无法真正认识陶、王诗的价值。

考德威尔等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强调从艺术创作中个人“内心活动”去寻求“可能实现的理想”(社会主义)。威廉斯认为,这种论调违背马克思关于“存在”和“意识”的基本命题。考德威尔是英国早期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家,1935年开始写作并于1937出版的《幻觉与现实:诗的源泉研究》是英国第一部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文学的重要著作。考德威尔对诗歌的产生和发展,诗的语言和社会关系、英国资本主义各阶段主要诗人的作品,都作过系统的分析和研究,并且以诗为例证,批判了作为近代西方文艺理论基础的资产阶级心理学,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美学原理和方法。但应该指出的是考德威尔的论述中也有一些牵强的地方。威廉斯在本书中对考德威尔那种“刻板的方法论”,即那种认为“研究一种民族文学,谁就要从文学与之息息相关的经济史入手,然后将文学置于其中,并依据它对文学加以解释”的研究方法,表示了不同意见。他认为,这种方法虽也能从中有所收益,但总体上来说,是牵强的和肤浅的,这是因为,经济因素虽然是起决定作用,但它决定的只是整个生活方式,而文学同整个生活方式关联,而不是唯独与经济。因此这样的文学批评必然会导致它的抽象性和非现实性。考德威尔正是不作具体分析,将15世纪以来的诗歌全部判定为“资本主义诗歌”,把本世纪的西欧文学全部称之为“颓废文学”。威廉斯严肃指出,考德威尔这种描述必然导致用一般结论来代替实事求是的分析,是用牺牲现实来成全一种公式。出现这种偏向的主要问题是不能恰如其分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上层建筑”的科学概念。

威廉斯看到了一些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在注释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时的混乱,并试图对此作出自己诠释。但他由于没有真正把握马克思主义,因此常常滑到自相矛盾的境地。他既承认马克思关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公式的正确性,又说这个公式是抽象的,它无法包容相互交织的“实际经验”的结构。他从“存在决定意识”出发,进

而对列宁的“只靠本人的努力,工人阶级只能够发展工会意识”论述绝对化(列宁在这句话中强调的是革命理论的指导作用),说列宁“主张劳动阶级无法创造一个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马克思关于阶级和意识形态关系和存在与意识关系的解释是矛盾对立的。威廉斯仅注意到列宁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与马克思、恩格斯表述有所不同,而忽视了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一致性和延续性,这样由对列宁思想的片面理解而得出他自己片面的结论。

威廉斯不赞同在一个新的社会中,去人为规定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他对苏联对文学作一种人为“权威命令式”的规定(如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的挂帅)表示疑问。他认为,如果你习惯地认为文学与社会关系单纯而直接,那么,以“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挂帅就会似乎有理,而且可以得到一种与此运动相适应的文学。但是,既然是“存在决定意识”,那么,人们就会发现要事先规定任何一种特定的意识决非易事,除非作规定的人能巧妙地把他们自己等同于“存在”。威廉斯认为,在一个社会主义社会中,当基本的文化技能已被普遍掌握,沟通的渠道已经扩大并已经畅通,一切可能做到的都已经准备就绪时,这样就会达到一种对整个事实的反映,从而就具有价值。威廉斯的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但他在这里又片面地把实践(存在)和理论(意识)对立起来,因为一种正确的文艺政策(意识形态或理论)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它具有指导行动的功能,但还应在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和发展。伊格尔顿曾批评威廉斯从来不想从理论上区分主观经验和客观社会条件。实际上,威廉斯有时过分割裂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威廉斯是一位具有国际影响的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论家,既是传统的又是朝向未来的文化社会活动家。在结构主义风起云涌的60年代和70年代,他的作品和思想一度被指责为保守的、停滞的,甚至是倒退的。连他最得意的学生伊格尔顿也转向法兰克福学派而批评过他。但是,到了80年代,结构主义经过了后结构主义和

解构主义阶段后走向了下坡,新历史主义批评开始抬头,使学术文化界重新认识威廉斯。伊格尔顿在1986年的一个访问记中曾说:威廉斯的停滞实际上是在坚持某种自己的立场。威廉斯是有预见的,在他的著作中,人们很可能发现他所坚持的那种立场和形式与他们现在的一致。我对威廉斯的批评,并不是与他在理论上的分歧,而是对他作品的政治力量是否赞同的问题:他对批评家在学术界的作用所持的态度,他对什么应该是文学批评的态度,以及他对文化研究和超学科界限的必要性的态度。所有这些,在威廉斯的作品里从一开始就明显存在。而正是这些因素使一些像我这样的人现在重又转向他的作品,因为它们确实比那些理论的区分更加重要。伊格尔顿还认为,威廉斯比任何时候都更接近马克思主义,不论我们给他的著作贴上什么标签,它们仍然是发人深省的、客观的马克思主义著作。<sup>①</sup>伊格尔顿的话虽有溢美之处,但也可以看出,威廉斯在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中的重要地位。

近年来,我国翻译了不少西方文化理论和文学批评的著作,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各派著作如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卢卡契、萨特、戈德曼、马尔库塞、阿尔杜塞、杰姆逊、伊格尔顿等人的著作也介绍了不少,但却尚无介绍威廉斯的著作。译者正是抱着这样一种补缺的目的去翻译《文化与社会》,向读者提供威廉斯思想文化观念的一个侧面。同其他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样,威廉斯的思想有他合理正确的地方,也有许多失误甚至荒谬的地方,这个前言只是提到他在《文化与社会》中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看法。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应该认真鉴别。正像著名哲学家黄楠森教授所说的,“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全盘否定的办法,应该了解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问题”,“无论如何得承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思潮,它确实是在研究一些现实问题,而且是马

---

<sup>①</sup> 转引自王逢振:《今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第91页,漓江出版社,1988。

克思主义还没有解决的一些问题”。<sup>①</sup>

本书是根据英国企鹅丛书 1983 年版译出。

**译 者**     1988 年 3 月初稿   1989 年 12 月二稿

---

<sup>①</sup> 黄楠森：《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 年代简表

(表中所列的是本书中讨论的作家二十五岁之年)

伯克(Edmund Burke)	1754
边沁(Jeremy Bentham)	1773
布雷克(William Blake)	1782
科贝特(William Cobbet)	1787
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	1795
欧文(Robert Owen)	1796
柯尔律治(S. T. Coleridge)	1797
骚塞(Robert Southey)	1799
拜伦(George Gordon)	1813
雪莱(P. B. Shelley)	1817
阿诺德(Thomas Arnold)	1820
济慈(John Keats)	1820
卡莱尔(Thomas Carlyle)	1820
纽曼(J. H. Newman)	1826
狄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	1829
摩利斯(F. D. Maurice)	1830
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31
盖斯凯尔(Elizabeth Gaskell)	1835



普金(A. W. Pugin)	1837
狄更斯(Charles Dickens)	1837
乔治·罗斯金(John Ruskin)	1844
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	1844
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	1844
阿诺德(Matthew Arnold)	1847
莫里斯(William Morris)	1859
惠斯尔(J. A. McN. Whistler)	1859
佩特(Walter Pater)	1864
马洛克(W. H. Mallock)	1874
萧伯纳(Bernard Shaw)	1881
王尔德(Oscar Wilde)	1881
吉辛(George Gissing)	1882
贝洛克(Hilaire Belloc)	1895
托尼(R. H. Tawney)	1905
休姆(T. E. Hulme)	1908
劳伦斯(D. H. Lawrence)	1910
艾略特(T. S. Eliot)	1913
理查兹(I. A. Richards)	1918
利维斯(F. R. Leavis)	1920
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28
考德威尔(Christopher Caudwell)	1932